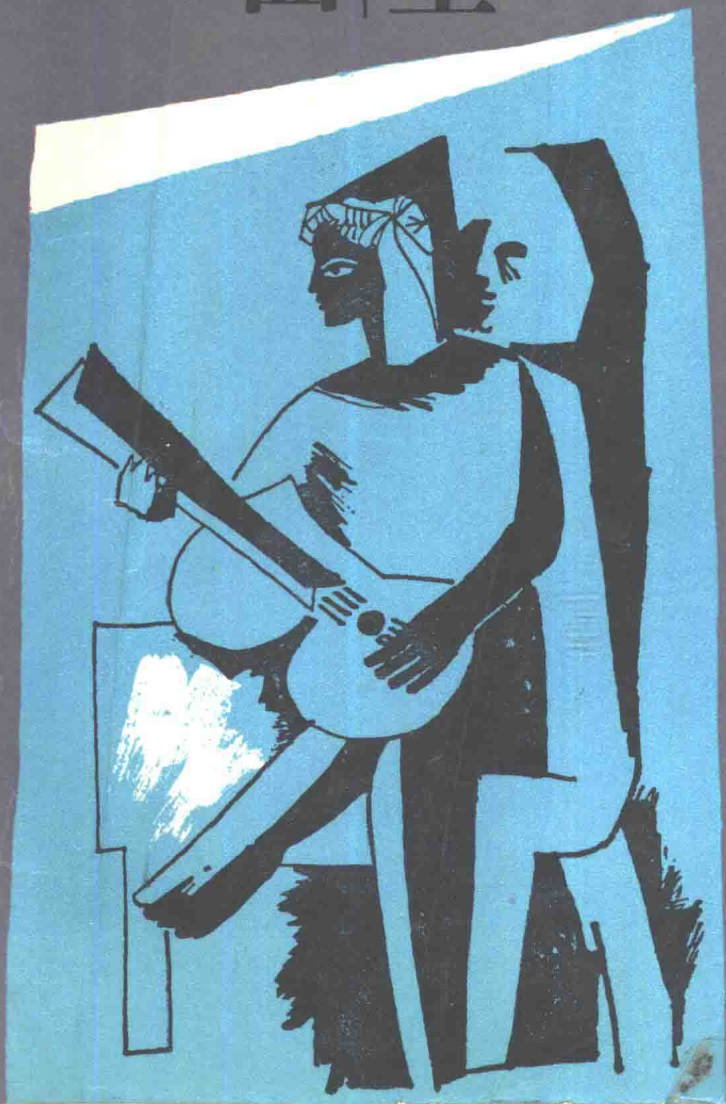


大学生 变奏曲

北京长篇小說创作丛书
李 宪



大学生变奏曲

李 宪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大学生变奏曲》(原名《超越贡嘎岭》)是一部有特色、有哲理深度的描写当代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通过大学生刘依平和高亚敏在毕业分配的“生存竞争”中的“爱情交易”，以及他们走向社会以后严峻的生活沉沦和深刻的精神蜕变，反映了八十年代大学生寻找人生道路的复杂经历，展现了这一批大学生的独特命运。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八十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塑造了富有时代色彩的大学生形象，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浓郁的思辨色彩。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大学生变奏曲

Da xue sheng bian zou qu

(原名：超越贡嘎岭)

李 宪

出 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45,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1,000

ISBN 7-5302-0055-0/I·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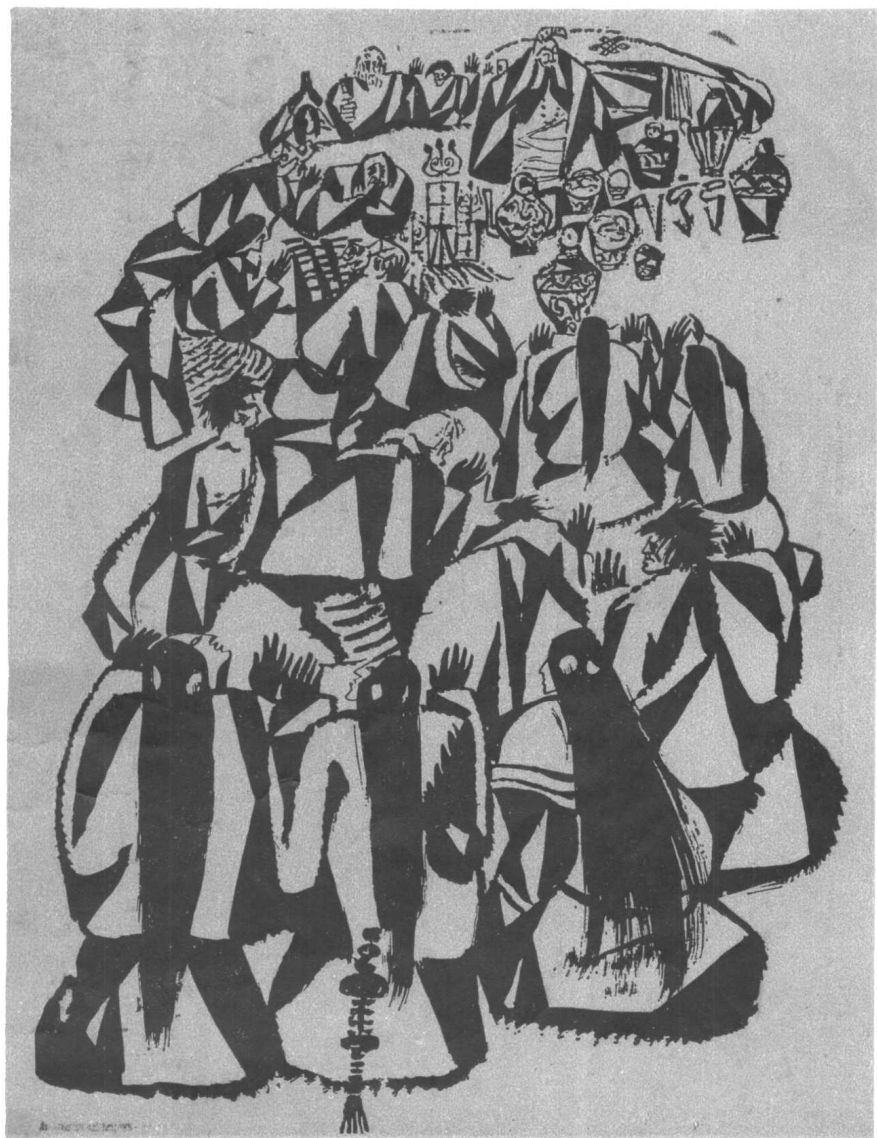
定 价：3.90元



李 寔









认识自我与超越自我

——代序

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这还不包括动笔前的酝酿、构思、思考、以及去藏族地区体验生活所耗费的时间，就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而言，这时间似乎过长了些。

尽管我真心诚意地下了大力气，而且写得很苦，但它却是不成熟的。

尽管它竟有幸付梓问世了，但它是否真有幸献于广大读者的价值，仍是我揣揣的。

的确，我始终怀疑自己，过去、现在、也许直到将来。自然不仅是怀疑自己的写作才能，而且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态度，都抱着时强时弱的怀疑。我不知道，这种深刻的怀疑是源于我过于敏感的性格气质，还是多年的坎坷曲折留下的阴影，或者是这个时代对我们个人的必然。我执拗地希望能活得明明白白，活得清清楚楚，却反而时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我老在寻找，寻到最后，连自己也不明白究竟在找什么，究竟能找到什么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嘲讽为“钻牛角尖”的傻瓜

吧，好端端的人，偏偏要折磨自己，自寻出许多烦恼和悲哀。

从某种角度讲，《大学生变奏曲》便是这种怀疑的产物。与其说我是在写小说，不如说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力图更清醒地认识我和我们，更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伟大的喧嚣和躁动的时代，以求能不断地调整自己，超越自己，真正地走进生活，使个人与整个时代达到完全的和谐。我真诚地以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面对这个新旧嬗递的历史转折时期，没有勇气对自己做一番坦率严厉的清算，把头脑中所有不切实际的、属于过去时代的、以及似是而非的东西统统扬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

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在新中国教育史上，1977级、1978级大学生是绝无仅有的一代人，由于历史和时代的成因，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经历、思想素质、道德水平和知识结构，他们注定要在中国的未来显示出无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价值，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今天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局限和弱点，是十分必要的。我想写他们的念头，由来已久，我自信有资格、也有责任写出他们痛苦的求索和自强不息的生活道路。我熟悉他们，而且作为他们中的一个，我自己也需要严厉的解剖。大学四年，我也曾是一个思想激进、忧国忧民的热血者。从怀揣录取通知书，以“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大学生”的身份跨进大学校门时的自豪、激动、庆幸和轻狂，到毕业分配时的惶恐、消沉、徘徊和竞争，我都亲身经历过；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而兴起的结社、出版地下刊物，到竞选县区人民代表、重庆高校学生代表秘密集会，筹备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等等等等，我都是最积极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在思想上，我们同样经历了痛苦的砥砺，从怀疑、反思到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从

传统的儒家思想到现代的分析哲学，直至最终“回到马克思”，就中甘苦，非过来人难以理喻。对这批大学生，对四年间大学里发生的这一切，历来毁誉参差，贬多于褒，如何定论，现在仍然为时尚早，但勿庸置疑，我们是真诚的，绝无利己之心，否则，明知有“毕业分配”，明知个人结局不好，就不会不“安定团结”、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了。不甘寂寞的性格悲剧，即使经历了十余年翻云覆雨的惨痛教训，却“虽九死其犹未悔”！

直到今天，一想到那四年，一想到那些可敬的同学，我仍然激动不已。我要写，我甚至已拟就了一部长篇小说的详细提纲，然而我终于没有动笔，因为我开始怀疑了，致命的怀疑！大学毕业，走进社会，在严峻的现实里沉浮，我忽然看见了自己的可怜与渺小，看见了我们同现实的距离与隔膜。我感到一种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的悲哀，走进生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通人，并非轻而易举。照理说，象我们这种年龄和经历的“大学生”，是不应该发生这种问题的，那么，原因何在呢？在相对封闭的学校里，我们的自我感觉太好，自我意识太强，在内心最充分地体验着自我的分量；我们自信所有问题都已在思想上得到了解决，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剩下的只是“革别人的命”。然而，这种脆弱的精神优越感终究不堪一击，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坍塌了。任何思想和任何个人，只有在博大纷繁的社会生活中，才能显出其分量的轻重。当然，我并不想妄自菲薄那四年的奋斗和求索，但回过头去，我毕竟看到了它的幼稚和书生气。

生活使我震动。我看到，仅仅不过两三年，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曾经深恶痛绝以为无可药救的种种积弊，正迅速地被清除；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更是

我们当初也不曾想、也不敢想的。形势的进展和改革的步伐，使我们这些自以为思想最解放、最激进的人都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措，甚至难以接受，成为落伍者。我们那些激烈的讨论啦、大胆的探索啦、崭新尖锐的观点啦、了不起的方案啦，在今天看来多么虚无、多么微不足道。这是我们时代的领袖们无与伦比的沉着、魄力和历史感，他们才真正理解中国这块土地。他们使我认识了那种学生腔的清谈和小知识分子的慷慨激昂的滑稽幼稚。

然而同时，我又痛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另一方面。道德的普遍沦丧、拜物主义的泛滥、全民文化素养的低劣……种种新的社会矛盾，和旧有的痼疾掺合在一起，日益严重地腐蚀着人们的生活。历史每前进一步，必然充满迷乱、骚动、分化和阵痛，可是仅仅以历史的评价或者道德的评价之争，是不足以概括我们头脑中的混乱，也不足以认识这个时代的全部内涵的。怎样认识上述问题，我常常感到困惑。究竟我对还是错？我究竟是以什么标准在衡量这一切？这标准本身是否正确？我们仍然习惯于用一种思想模式，一种价值标准去评判人与事，可铁板一块的时代正被历史的狂潮击得粉碎；多样化的选择、多层次的标准、多向性的人……一切都不再是唯一的、非此即彼的了，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执迷不悟者就只能是落伍者，徒自伤悲。是的，说到底，我们毕竟有一半属于过去的时代，我们自以为摆脱了它，可身上自觉不自觉地烙着它潜移默化的痕迹，这，也许就是我们个人的悲剧之所在，就是今天的困惑和失误的根源之所在。

毕业离校这几年，同学中间也在不断地分化：有的消沉了，庸庸碌碌，苟且度日；有的做生意发了大财；有的在苦

心专营，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执着地追求，其中不乏有所成就者……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压抑、不满、躁动、抱怨。我自己也不例外，三年来动辄碰壁，不断受到各种冲击，我懂得了社会的分量，我学会了发牢骚……我总在想，出现这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情绪，是否就因为上述的困惑？我以为，对生活是不该抱怨的，它本身不会错，错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与这个时代不太和谐的时候，我们也许更应该严肃地审视一番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态度。

由此，我感到总结清算自己的迫切性。四年的大学生活固然应该写，但今天，更要紧的是清除掉它的消极影响。我们不能再沉迷于清谈和冥思、苦闷和彷徨，时代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即便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于是我写了这部小说，希望它是一个句号，对过去的生活，对这两年的沉沦和惶惑。我更希望在面对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趋势时，它能有所启示。

应该说明，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是个庞杂的组合物，不同的经历、选择、处境以及性格，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态度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似乎都是一个中心，都自成体系，不可能用几个形象就能概括。明知不能，我亦无意于此，我只想写出几位我熟悉和尊敬的同学，写出他们的思想蜕变和生活历程，显然，他们不能代表整个的这一批人。我相信，在这批人中，肯定还有许多朋友也在想、也在写，他们的生活和作品都比《大学生变奏曲》厚重成熟得多。

认识自我才能超越自我，而这又起始于对自己的不满和怀疑。我常常记起一位哲人的话：“如果一个人以确信开始，那他

044187

将在怀疑中结束；但如果他满足于以怀疑开始，那他将在确信里告终。”（培根《学术的进步》）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几乎都有生活原型，几乎都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及其行为。写作过程中，我思考得最多，也最偏爱的要数刘依平这个形象。倘若这部小说真有点价值的话，我想首先就体现在他身上。

他是一个从表到里都渗透矛盾的复杂人物，一个真诚得痛苦的灵魂。一方面，他始终在内心执着地追求生活的真谛，崇尚真善美，渴望获得纯粹的精神法则和终极的真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无法摆脱利欲的诱惑，为了得到或者维护某种实际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干出许多卑微的举动。他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痛苦便由此而产生：一边不断地自责、忏悔，痛苦不堪地诅咒自己，一边又照样随波逐流，甚至变本加厉地干着卑鄙的事；一边拼命保持知识分子的高尚、孤傲、自尊及所谓的“良心”，一边又以小市民的世故、庸俗和精明而行事。他无可奈何地为自己寻找解脱的理由，他甚至想用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完善”，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良心的慰藉。然而，对他这种思想水平的人来说，很清楚这是自欺欺人，内心不可能有片刻的平衡和安宁。他最终的怀疑、悲观，以至产生深刻的精神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这种两重人格是因为历史的阴影、生活的磨难造成的，那么，置身于今天的时代，这个精神的强者、行为的侏儒就倍感痛苦。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今天的喧嚣和躁动，正孕育着绝大的希望，他所追求的理想——曾经一再碰壁的理想——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实现的可能性。他拼命想走进这个时代，

而他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是很难走进并有所作为的。从这个意义讲，他是一个“多余的人”，但又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多余的人”，而不同于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内涵。

很显然，刘依平的全部行为所展示的，除了他所属的知识份子阶层赋予他的种种秉性、他的具有一定典型性的经历及个性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具有那个正在被取而代之的时代的性格特征，他的苦闷、彷徨、自责和痛苦，正是由于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尽管他曾是一个“强者”，曾是一个壮怀激烈的青年先行者，思想达到了某种高度，但如果不能超越自我，面对这个时代，就只能是个局外人。他的复杂性，不是通常那种拼盘式的优点加缺点的“复杂性”，而是理性和人性的复杂化。他的严厉到变态程度的自我审视（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和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完善”），已经超出了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哲学的深层。

多层次地、立体地表现这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复杂人物，并由此折射一批人的共同特性，是我创作的主要动机和追求。由于思想水平有限，我不知道对他的把握是否准确，而且某些地方的处理，似乎笔下留情了。不过对他最后的走向，我确颇费了一番踌躇。他究竟垮掉了还是终于走出了泥潭？生活中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事实上，刘依平的生活原型的确是垮掉了）。然而我终于选择了后者。我认为，尽管刘依平有种种局限和弱点，他依然是我们中间的优秀人物。他是可爱的，他的觉悟也是重要的，至少，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上，他能为我们展示一种更有魅力更有希望的可能性。

应该承认，高亚敏这个人物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意念化痕迹，

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她跟刘依平完全不同，严格地说，她是一个平庸的人，起点不高。她身上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这复杂性只是一种肤浅的自尊与自卑的混合物，小市民心理与女大学生外形的杂交。如果说刘依平的复杂性主要源于过去的时代和精神的困境，那么高亚敏的复杂性则更多是其阶层属性的结果。倘若不是对刘依平的痴情和毕业分配时的一念之差，导致后来的生活完全走了样，她本来很可能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的。她不可能象刘依平那样，从理性的高度，自觉去认识时代与自我；以她的思想素养和智力水平，也不可能在事业上有大的成功。事实上，她的每一次转折和升华，都更多地来自外部动力，她是个被动的承受者，甚至充满了偶然性。当然，这种偶然其实是时代的必然，但对高亚敏来说，要自觉认识到这种必然，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她的真正成功，是终于摆脱了女大学生的时髦病，回到了坚实的土地上，走出了阴冷狭隘的内心，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开始了踏踏实实的生活。就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看，她最后似乎应该变得心胸旷达、淡泊宁静，甚至有点看破红尘。可惜，也许是想与刘依平造成更强烈的对衬，或者出于我某种潜意识的顾虑，小说后半部有些拔高她了。

《大学生变奏曲》选材于当代大学生生活，尤其是选取了刘依平、石庆林这样一群人的思想蜕变为主要表现对象，因此，如何处理他们庞杂的思想和深沉丰富的内心活动，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回避写它，就失掉了这批大学生最本质的特征，以至根本无法写出他们的真实面目；而写它，又势必造成长篇宏论，理念太重，犯了小说的“大忌”。我考虑再三，选取了后者，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对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小说忌讳的是理念大于形象，形象演绎概念，而对特

定的题材和特定的人物，长篇大论的思想表述，非但不会削弱人物形象，相反恰恰是塑造人物的有力手段。两者并不矛盾。至于这么写是否影响了可读性，则属于读者对象问题了。我以为无论如何努力，这类题材的作品都不可能有象武侠侦破作品那么众多的读者。近年来文学艺术界已经注意到读者（观众）的多层次问题，考虑到可能对《大学生变奏曲》感兴趣的会是些什么样的读者，似乎就不必对“可读性”太过虑而束手束脚了。

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结构、语言等方面，我也就不那么遵守“小说作法”了。譬如结构，第二部的结尾似乎就达到了全书的高潮，刘、高、苏的关系就得到了解决，因此第三部显得有些松散和离题。有朋友建议把第二部的结尾挪到最后，起承转合，使整个结构紧凑完整。这无疑是正确的意见，但我终于还是保留了现在的结构。我想忠实生活发展的顺序和逻辑，在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中，多层次地表现主人公不同内涵的沉沦和觉悟。小说前半部分，刘依乎困于个人处境和三角关系的矛盾，其迷乱更多地偏向道德思考；而后半部分，由于感情纠葛暂时得到解决，他的目光更多地移向社会和时代，其新的矛盾显然具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小说主题和情节的重心也该做相应的转移。这样也许更符合创作的初衷。语言也如此，一般地讲，书卷气学生腔太重，自然是件坏事，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未必不是一种风格。本来就写的一群知识分子气十足的大学生，过分生活化、过分粗野的语言，反而不大协调了。

我承认，我是在自寻辩解的理由（瞧，又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了），也许我的设想根本就不对，也许说到底，是我功力不够而发生的毛病，何必自欺欺人呢！不管怎么说，我诚恳地希望能得到读者和行家们的批评指正。